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法】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 著 辛岩 译 陈志雄 郭强 古伟瀛 刘益民 审校

耶稣会士张诚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 J.
(1654 — 1707)

耶稣会士张诚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

【法】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 著 辛岩 译
陈志雄 郭强 古伟瀛 刘益民 审校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 J.
(1654 — 1707)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
(法)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
(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5347-5338-1

I. 耶… II. ①博…②辛… III. 张诚(1654—1707)—
传记 IV. B979.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752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

作 者 [法]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

译 者 辛 岩

审 校 陈志雄、郭强、古伟瀛、刘益民

责任编辑 王莉娜

责任校对 牛志远、李建平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编 于 沛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 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恩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LOUVAIN CHINESE STUDIES II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 J.

(1654 – 1707)

Un des cinq mathématiciens
envoyés en Chine par Louis XIV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 U. LEUVEN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 J. (1654 – 1707) : Mathématicien de
Louis XIV et premier Supérieur général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Chine
(1700 – 1707)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 U. Leuven
Ed : Jeroom Heyndrickx, C. I. C. M. , 1994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

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

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南
懷
仁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atho-
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本书在得到南怀仁文化协会的支持下,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策划,其翻译及审校工作亦得到南怀仁文化协会的帮助。

前 言

1982 年南怀仁研究中心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之内成立,目的是为了提倡中国天主教教会史的研究,特别是欧洲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以及双方友好关系的贡献。首先我们强调的是南怀仁的研究,南怀仁是一位诞生于比利时的传教士,也是中欧关系史上的伟大先驱者之一。他在 1688 年去世不久之后,即因为在中国的伟大贡献而在比利时声名大噪,18 世纪布鲁日为他建了一座雕像,至今那雕像仍矗立在当地;20 世纪南怀仁的第二座雕像在他的家乡 Pittem 建立。尽管他知名度颇高,人们对于他的科学贡献却所知甚少,因为从事这方面学术研究的人并不多。1988 年南怀仁研究中心在鲁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提倡南怀仁的研究,会议论文集由“华裔学志”出版,协会的资深研究员——高华士博士,至今已出版了两本深入探讨南怀仁的书,另外他的第三本和第四本书预计 2009 年出版在协会的“鲁汶中国丛书”之中。除此之外,我们在过去的 25 年中也出版了研究柏应理和鲁日满的书,关于鲁日满的研究已被翻译并出版在清史系列之中。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e 女士在这领域是自学的专家,她出版了张诚(耶稣会士,1654—1707)的研究,张诚是法国最出名的“国王数学家”,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派遣到中国的宫廷,这研究非常契

合我们的“鲁汶中国研究丛书”，因为正是南怀仁把张诚介绍给中国的皇帝，并让张诚指导他关于西方的科学事宜，我们很乐意见到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并收录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的丛书之中。

2009年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计划与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合作，共同在北京召开我们第十届的学术会议，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有更多的出版品被翻译成中文。未来我们将继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投入现代中国的研究，还有低地国传教士与中国的合作，以及他们对建立中国天主教会的贡献。协会特别强调教会对“中华无名英雄”的研究，也就是研究那些对建立中国本地教会有卓越贡献，可是却不为人知的国籍神父、修女和一般教友。总之，我们乐见中国人与非中国人、教友与非教友之间的合作研究，我们的标准是建立在历史档案的稳固学术基础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与中国学术机构合作的原因。

韩德力，圣母圣心会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主任

序 言

17 和 18 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著名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于 1697 年写道：“我认为这一传教事业无论对于天主的荣耀来说……还是对于人类的普遍幸福以及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在我们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当前最重大的事件。”^①在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具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陌生而神秘的，他们只有凭借耶稣会士的记述才能对这个国家略有所知。所以，耶稣会士堪称第一批汉学家。中国和欧洲的学者与文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是产生。

在为博西耶尔夫人所著《17 和 18 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1644—1709。安多平施》（*Un Belge mandarin à la Cour de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toine Thomas. 1644—1709. Ngan To P'ing-che*）（以下简称《17 和 18 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评述颇有见地，他说：“从利玛窦于 1583 年进入广东到钱德明神父于 1793 年在北京去世，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令人兴味盎

① 伊莎贝尔和让·路易·维斯埃尔编：《耶稣会士中国传教信札（1702—1776）》（*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巴黎，1979，第 13 页。

然,这不仅仅是由于它在这一时期的传教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的发现与著名的礼仪之争在欧洲激起的波澜,而且是由于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接触的最引人注目的范例。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和历史同样丰富多彩,而且他们都坚信自己的传统具有普遍价值。毫无疑问,从来没有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为了相互了解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①耶稣会或许是当时能够创建这种功勋的唯一修会。

耶稣会士在北京宫廷中的影响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可以说从未中断过,这种情形在欧洲乃至教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可惜的是,教宗克莱孟十四世于1773年7月21日敕令解散耶稣会,结束了这段历史。人们很难想象,为了保住在中国宫廷中的地位,这些耶稣会士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要有多么坚定的信仰,要保持多大的耐心,要经历多少挫折,要使用如何机敏的交际手段,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甚至在京城以外的基督徒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时期,他们也能够保住自己在宫廷中的位置。

在这两个世纪中,耶稣会有数以千计的会士被修会培养成既是学者又是传教士的精英人物。我要再次引用谢和耐的话:“毫无疑问,传播福音从未苛求如此多种多样的才干和技能。为了满足学界的期望,尤其是宫廷的需要,几乎没有这些传教士未涉足的领域:数学、天文、医学、绘画、音乐、建筑、机械……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长期致力于学习中国文言文与学术传统。他们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从事工作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②

* * * * *

然而,耶稣会士的科学与文化工作并非其事业的首要目标。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传教事业。这些耶稣会士抱着使中国人归信基

① 博西耶尔:《17和18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巴黎,1977,序言,第7页。

② 博西耶尔:《17和18世纪在中国宫廷的一位比利时官员——安多》,巴黎,1977,序言,第8页。

督的理想启程来华。该会在华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亚洲伟大的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使不少印度民众接受福音之后,沙勿略来到日本,他意识到了两件事情:首先,在与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民族接触时,显而易见的是,要传播福音,就必须重视该国的文化与宗教;其次,最好的方法是先从知识精英、皇帝、高官和文人入手。因为民众景从他们。他同时认识到,日本的高度文明源自中国。因此,如果要归化亚洲,就必须前往中国,设法觐见皇帝。

为了实现其梦想,沙勿略启程前往中国。但他满怀遗憾地于1552年12月2日在中国大门口的一座小岛——上川岛上去世。就在几个星期之前(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1552—1610)——一个将要实现沙勿略梦想的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者——诞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居于沙勿略与利玛窦之间的是另一位气魄非凡的耶稣会士,即耶稣会亚洲视察员、那不勒斯人范礼安神父。他本人亦怀有沙勿略式的梦想,并选择其意大利同胞罗明坚和随后的利玛窦这两位才华出众的学者着手开拓中国传教事业。在投身于这一巨大的冒险性事业之前,他们必须先深入了解中国的语言与文化。

* * * * *

在那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微。他们只能逐步揭开这一称之为中华帝国的幅员辽阔的國家的面纱。中国以世界的中心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藩属或附庸。它把外国人当作未开化者加以提防。漫长的国境线被封锁起来并加以严密警戒。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组织严密,权力高度集中。在数个世纪里,中国文明一直居于欧洲文明之上。

* * * * *

经罗明坚和利玛窦多番恳求,广东总督终于邀请他们到其辖区首府^①展现欧洲丰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

① 指肇庆。——译者注

这一艰巨事业的成功要特别归功于利玛窦,他比罗明坚更年轻,更具天赋,也更有备而来,后者受范礼安的派遣于1688年返回罗马。耶稣会士的出发地是澳门半岛,明朝皇帝出于通商目的而将此地让予(应是强行租占——译者)葡萄牙人,澳门遂成为欧洲人商业与宗教活动的中枢,后来它却变成反对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堡垒。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和利玛窦获得进入广东的许可。在成功地进入北京(1601年1月)并得蒙皇帝召见之前,利玛窦还要付出17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利氏是以杰出的中国文人和西方科学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以其丰富的数学、天文、地理知识和对中国经籍的了解而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利氏才智超群,天赋过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同时,他和蔼可亲,性格坚毅,谈吐儒雅,善于交际,友朋遍布朝野,并赢得了皇帝及其近臣的信任。

利玛窦因其新开创的传教方法而闻名。这位大胆的革新者将中国传统的精华要素融入教理,使天主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适应。他允许基督徒祭祖敬孔,认为这些纯粹世俗的礼仪已不再具有宗教意味。他还运用中国传统的宗教术语来翻译天主教的概念,如“天主”(Dieu)。这种本土化(*inculturation*)是一种变革性的传教方法,它很快就遭致反对(详见下文)。

其他耶稣会士继承了利玛窦的传统。和他一样,这些人素养颇高:意大利人龙华民,尤其是德国人汤若望和弗拉芒人^①南怀仁。南怀仁这一学识渊博的天才后来成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康熙皇帝的心腹,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负责北京观象台和修历工作(1669—1688)。^② 南氏接受了清朝官衔。耶稣会士执掌这一高级职务直至1774年。

福音传播方面,耶稣会士的努力也结出了硕果。据统计,1624

① 弗拉芒人(*Flamand*)指比利时北部地区讲荷兰语的居民。——译者注

② 由于历法负有调节民众社会与宗教生活节律的职责,所以每年的修历工作非常重要。

年有 1.3 万名基督徒,其中士流颇众。1650 年,基督徒人数约为 15 万,1664 年为 25 万。到 17 世纪末,基督徒人数已达 30 万,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康熙皇帝的宽容与同情。在 18 世纪接连不断的教难中,基督徒群体通常在秘密状态下得以幸存。

* * * * *

在南怀仁来华之时,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是一个葡萄牙传教团体,尽管大多数传教士都属于其他国家。1493 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就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新大陆进行划分。他也将传布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两国的国王,而没有预见到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弊端。^①保教权经常被用于促进政治和商业利益。大体上说,除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外,亚洲成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传教士到东方来必须乘坐葡萄牙船只,持葡萄牙护照,为葡萄牙利益服务。耶稣会在印度设立了修会会省(设于果阿),下辖日本副省和中国副省(分设于澳门和北京)。葡萄牙在印度支那、日本和中国粗暴地行使其保教权,这些国家并没有沦为它的附庸,但它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商业往来。

为了确保中国传教事业的未来,南怀仁于 1683 年派遣其同会会士、比利时人柏应理返欧招募精通数学和天文学的传教士。^②通过路易十四的大臣和国务秘书科贝尔的介绍,柏应理终于引起了太阳王的关注。国王被他的这一理念所打动,并相信通过这种方式,法国可以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扩大自身的影响,因为法国在这一地区落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之后。国王决定向中国皇帝派遣 6 位精通数学的耶稣会士,并赋予他们巴黎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而根本不理会这样做是否会招致罗马和里斯本的不满。此项事业完全由

① 原文中的 Patronato 和 padroado 均为“保教权”之意,前者为西班牙文,后者为葡萄牙文。——译者注

② 参见韩德力编:《耶稣会士柏应理(1623—1693),将中国介绍给欧洲的人》(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华裔学志专题系列”,德国圣奥斯定,1990。